

浅析《洛阳伽蓝记》的研究现状与前景

刘 洋

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上海

收稿日期：2026年6月12日；录用日期：2026年6月24日；发布日期：2026年7月22日

摘 要

北朝东魏史学家杨衒之所著《洛阳伽蓝记》着重记述北魏时期洛阳佛寺的兴衰，同时以相当大的篇幅描述了当时的政治、人物、风俗、地理、传闻故事等情况，具有很高的文学与史学价值。本文将从作者及写作背景、文本校勘、洛阳形象与北魏社会、园林美学四个层面对《洛阳伽蓝记》的历史学术研究成果进行简要梳理与总结，旨在呈现关于此书前人丰硕的研究成果，捕捉过去研究的薄弱点，从而为后继研究者提供借鉴。

关键词

杨衒之，《洛阳伽蓝记》，研究综述

A Brief Analysis of the Current Status and Prospects of “A Record of the Buddhist Temples of Luoyang”

Yang Liu

School of Humanities, Shanghai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Received: June 12, 2026; accepted: June 24, 2026; published: July 22, 2026

Abstract

“A Record of the Buddhist Temples of Luoyang”, authored by Yang Xuanzhi, a historian of the Eastern Wei during the Northern Dynasties, primarily chronicles the rise and fall of Buddhist temples in Luoyang in the Northern Wei Dynasty. It also devotes considerable space to the politics, figures, customs, geography, anecdotes and other social conditions of that era, boasting high literary and historical value. This paper briefly reviews and summarizes existing academic research on the work from four perspectives: the author and writing background, textual collation, the image of Luoyang

and Northern Wei society, as well as garden aesthetics. The aim is to present the rich research results of predecessors in this book, capture the weaknesses of past research, and thus provide a reference for subsequent researchers.

Keywords

Yang Xuanzhi, "A Record of the Buddhist Temples of Luoyang", Academic Review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引言

北魏洛阳作为中古时期北方政治、文化与佛教中心，其城市兴衰与社会变迁是北朝史研究的重要议题。东魏史学家杨衒之所撰《洛阳伽蓝记》[1]，以洛阳佛寺的营建、兴盛与废毁为叙事主线，不仅详实记录了佛教寺院的地理分布、建筑形制与宗教活动，更以广阔的视野铺展北魏末年的政治变局、人物事迹、民情风俗、都城地理与轶事传闻，兼具史学实录的严谨性与文学叙事的艺术性，是研究北朝历史、社会文化、佛教传播及中古文学不可或缺的珍贵文献。

百余年来，学界围绕《洛阳伽蓝记》展开持续探索，在文献考证、文本阐释、专题研究等领域积累了丰厚成果。为系统把握学术脉络、明晰研究方向，本文拟从作者生平与成书背景、文本校勘与体例考辨、洛阳城市形象与北魏社会图景、园林美学思想四个维度，对既往研究成果进行梳理总结，在呈现学界研究实绩的同时，厘清现有研究的薄弱环节与未尽议题，以期为后续研究者提供学术参考与研究思路。

2. 作者生平与写作背景：史料阙如下的考证与阐释

关于《洛阳伽蓝记》作者相关问题的，如姓氏、籍贯、职位等的研究，看似微不足道，但实际上对于更好地把握本书的成书背景、内容以及观点立场具有很重要的作用，因此不可不察也。很显然，相关学者也意识到了这点，因此在这方面取得了一些进展，目前来看，具有代表性的主要有王建国的《〈洛阳伽蓝记〉的作者及创作年代辩证》[2]一文，在此，笔者将就研究成果与研究方法两个角度简要概括、分析之，希望对于后继研究者有所帮助。

该文主要从杨衒之的姓氏、籍贯、生平及仕历、《洛阳伽蓝记》创作年代及其他四个方面着手。在“姓氏”部分，文章首先列举了自隋唐以来关于《洛阳伽蓝记》作者衒之的姓的三种写法，分别是“杨”、“羊”与“阳”，并罗列了大量的文献资料对此进行简要梳理，得出争论主要在衒之的姓氏是“杨”还是“阳”上。接着，文章从内证、外证以及现存的隋唐文献著录等方面进行对比分析，得出了衒之的姓氏应该为“杨”的结论，引用丰富、条理清晰、逻辑严密，值得学习，笔者认为今后学者可以以此为基础继续向前探索杨衒之的家族谱系，以便更加深入的了解原著作者，为各方面的研究奠定更加坚实的基础。在“籍贯”部分，文章通过引用唐释道宣《广弘明集》[3]与《魏书·地形志》[4]的记载，指出目前关于此问题的两种不同的观点，即一种说法是杨衒之为定州北平人，另一种则是平州北平，接着，文章作者通过查阅《汉书·地理志》[5]与《后汉书·郡国志》[6]发现在两汉时期有两个名称都为“北平”的地方，然后，作者通过晋唐时期记载籍贯的惯例，结合严谨的推理分析，得出了杨衒之的籍贯为西晋时幽州北平郡的结论。笔者认为后继者可以在此基础上将杨衒之的籍贯细化到县、乡甚至是里、户，当然，关于此方面的记载甚为稀少，因此十分考验研究者旁征博引的能力。在“生平及仕历”部分，文章通过考察

杨衒之生前的官署推断出其卒于北齐时期。在“《洛阳伽蓝记》创作年代”部分,文章中通过引用大量的文献材料得出了《洛阳伽蓝记》的创作时间——“约为东魏孝静帝元年(543)至武定元年(547)的七、八月之间完成,大约用了五年时间,此五年间衒之一直任抚军府司马一职”([2]: p. 6)。在全文的最后,本文作者指出杨衒之的另一本著作《庙记》[7]对于研究《洛阳伽蓝记》有十分重要的补充作用,此前很少有人关注此书,因此今后的研究者可以加大对前者的关注,可以将其作为研究后者的补充资料,也可做比较研究。

总而言之,关于《洛阳伽蓝记》一书作者及其写作背景,前人已有些许可贵成果,但目前来看,关于这方面的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对于很多问题的探索尚存很大空白,有待细化、精确化,并且关注这方面的学者也较少,因此后继者若对此感兴趣,亦不乏为一个有前景的方向。

3. 文本校勘、版本与体例:从文献整理到范式突破

关于《洛阳伽蓝记》文本校勘方面的研究,自近代以来,张宗祥、范祥雍、田素兰、曹洪等学者在此方面用力颇深、成绩卓著。其中以唐晏《〈洛阳伽蓝记〉钩沉》[8]、杨勇《〈洛阳伽蓝记〉校笺》[9]、周祖谟《〈洛阳伽蓝记〉校释》[10]成就最高。三者在校勘上存有共通之处,三者都以厘清传世本混杂的正文与子注为核心任务,不满旧本割裂文注的弊病,参照《水经注》体例区分文、注,广泛取明清刻本、史书类书对校,订正文字讹脱,兼顾校勘与史实考证;但三者各有侧重,唐晏《钩沉》是较早系统梳理文注的开拓之作,以符号标注异文,却参校版本不足,考证略显简略疏漏,周祖谟《校释》以如隐堂本为底本,版本校勘最为严谨,偏重文字音韵训诂,校断审慎客观,成为通行精校本,杨勇《校笺》后出转精,汇总前代各家校本,征引文献广博,融合文史佛籍辨析异文,考证细密,只是部分校改带有主观判断,整体而言唐晏开创体例,周氏专精版本文字,杨氏集校勘考证之大成。

目前来看,关于该领域的探索,主要集中在古代汉语训诂学领域,学界有关此内容的论文有很多,譬如在王建国《〈洛阳伽蓝记〉丛考》[11]中,作者对于原文中“火凤舞”、“绿水歌”、“白马寺经函”、“《大乘义章》”、“弹指”、“跋陀”、“石关”、“白马寺”等阙疑之处进行深入的考证研究;在《〈洛阳伽蓝记校注〉标点献疑》[12]一文中,作者指出范祥雍《〈洛阳伽蓝记〉校注》[13]一书中的标点存在些许不尽完善指出,并指出这一问题主要表现为同类句式的标点不够统一、语句的内部层次不够明晰、有关引语标点的使用不够准确、陈述话语的完整性体现不够明确、语气的显示不够准确五个方面,并对每一个方面进行了详细举例,并一一加以论述,但遗憾的是,作者之后并未给出对于相关问题的解决方案,后继者或许可以就此处入手进一步研究;无独有偶,在《〈洛阳伽蓝记〉校注疑误商榷》[14]一文中对范氏文中的一些可疑内容也进行了纠正,并以“案”的形式呈现出来,但是缺乏有力的证据加以佐证,正如文章标题所写,仅为“商榷”,究竟正确与否,更待今后研究,从这两篇论文中我们可以看出范祥雍所著的《〈洛阳伽蓝记〉校注》一书存在较大争议,因此今后若从事《洛阳伽蓝记》方面的研究,在底本的选择上应尽量避免此书,即使使用该底本,也要先加以谨慎考证,以避免出现疑议。

另外,颇有新意的是,刘治立《〈洛阳伽蓝记〉自注的再认识》[15]一文将目光放在了《洛阳伽蓝记》所独有的作者自注上,阐述了在宋代以后传抄过程中将自注与正文混淆的现象,在此基础上,作者进一步阐述了在清代考据学的推动下,朱紫贵、吴若准等人关于区分自注与正文的难题上所做出的不懈努力,并指出唐晏《洛阳伽蓝记钩沉》虽然较为成功地将自注与正文分离,但仍然存在许多值得进一步推敲的地方。文章后半部分又通过介绍《洛阳伽蓝记》作者自注的内容、特点指出由于自注为作者本人所作,因而对于正确把握正文内容与观点大有裨益,今后学者或许可以沿着前人的成果继续甄别、分离原书中的自注与正文,并尝试以自注为切入点更好地释读全书内容。

上述三篇文献均围绕《洛阳伽蓝记》文本校勘、释读展开,依托训诂考据梳理传世文本讹误,均以

既有校本为研究对象并指出其疏漏,具备文献校勘的共同研究立场;但侧重点各有差异,王建国《丛考》聚焦书中名物、佛教语词等疑难词条,考据扎实,以字词疏解补正文本阙失;两篇商榷类文章专就范祥雍校注的标点、文字疑误提出驳正,前者分类梳理标点五类弊病却未提供修正方案,后者仅以案语存疑、佐证不足,二者均偏局部纠谬,缺乏系统性解决方案;刘治立一文独辟蹊径,跳出字词校勘,专门考察全书正文与自注混淆的源流及历代整理得失,深入挖掘文献,研究视角新颖,为文本体例复原提供新思路。整体而言,字词考据类成果实证性更强,商榷类文章多只提出问题而无完善修正体系,自注研究则开拓体例研究路径,仍留有深入考辨空间。

总而言之,前人对于《洛阳伽蓝记》的内容校勘方面已有丰硕成果,但难免存在疏漏的地方,笔者建议后继者可以在前人成果的基础上,进一步在内容勘改、点校、自注与正文的分离等方面向前探索。

4. 洛阳形象与北魏社会:城市史、经济史与文化史的多维解读

《洛阳伽蓝记》以记载北魏时期洛阳的寺院为总纲领,展开了对洛阳全方位的描写,涉及建筑、文化、贸易、交通各个方面,堪称是北魏时期洛阳城乃至整个北魏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

关于此书中的洛阳形象,近年来学术界有所关注,其中当以南昌师范高等专科学校人文科学系王柳芳的《论〈洛阳伽蓝记〉中的洛阳形象》^[16]最为系统,笔者在此处做以简要分析:作者富有创新的将杨衒之笔下的洛阳归纳为“帝王之宅”、“礼乐之邦”、“众生之城”、“国际之都”四个词语,将其放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四个坐标下,立体地刻画北魏时期洛阳城的景象。在“帝王之宅”部分,作者揭示了北魏孝文帝定都洛阳的原因——赢得民心、获得汉族士大夫的支持,并且进一步指出杨衒之具有强烈的文化本体意识,这表现为《洛阳伽蓝记》中潜在的地域偏见。

在“礼乐之邦”部分,作者通过《洛阳伽蓝记》中张伦造景阳假山的例子,论述了当时洛阳城内文人雅集、文化昌盛的繁华景象,进一步佐证了北魏汉化取得了巨大的成效。在“众生之城”部分,作者指出:“杨衒之往往以市民感受的角度来表达城市影像,显示出从城本位向人文化转移的趋向”(16]:p.9),又通过对《洛阳伽蓝记》中有明确姓名的人物的统计,发现该书中记载的人物囊括了各个社会阶层而不是仅限于贵族,从而佐证了市民文化兴起的观点,同时论证了洛阳不仅是帝王将相的宅邸,更是充满生活趣味的平民乐园,值得赞赏的是,与北魏时期其他强调森严等级的文学作品不同,此书中对普通市民日常生活的描写体现了杨衒之的人文关怀与普世情怀。在“国际之都”部分,作者通过举杨衒之详细记录的犍陀罗国胡王献白象、波斯国胡王献狮子以及寺庙建筑中西合璧、各国人民云集洛阳等现象展现了洛阳城国际大都会的形象,从侧面反映出洛阳经济尤其是海外贸易的发达。笔者认为该学者通过《洛阳伽蓝记》中对社会生活的描述来窥见城市风貌、并从多个层面把握洛阳城的历史分析方法值得借鉴。

对于《洛阳伽蓝记》中洛阳形象的研究,又可以扩展到对于整个北魏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探索上来,这方面的研究成果也有很多,就目前来看,具有代表性的主要有白翠琴的《一部拓跋鲜卑的别史——略论〈洛阳伽蓝记〉史学价值》^[17](以下简称《别史》)以及李靖莉的《〈洛阳伽蓝记〉的史料价值及不足》^[18](以下简称《史料价值与不足》),接下来,笔者就这两篇文章展开分析、归纳。首先,在政治方面,《别史》认为《洛阳伽蓝记》中关于永宁寺的记载详尽地描绘了北魏末年尔朱氏拥兵跋扈的历史事件,人民饱受摧残,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的历史图画,而在《史料价值及不足》中,则又以瑶光寺为例,指出:“永宁三年中,尔朱荣入洛阳,纵兵大掠,时由秀荣胡骑数十人,入寺淫秽,自此后颇获讥讪,京师语曰:‘洛阳男儿急作髡,瑶光尼寺夺作胥’”(18]:p.104),从而暴露了贵族名媛打着修行的旗号淫乐的放纵丑态。二者使用材料虽有所不同,但目光都聚焦在北魏末年的社会状况上。

再从经济方面来看,《别史》通过对北魏时期洛阳城规模的考察,得出当时洛阳城已颇具规模的观点,而城市规模又为城市商品经济的发展提供场地基础,又通过《洛阳伽蓝记》中商业区、“邸庄”的出

现,得出北魏时期经济繁荣的结论;而《史料价值及不足》上对于该方面仅有宏观的文字概述而无具体的论证,笔者认为今后学者若对北魏的经济发展与商品贸易感兴趣,可以从《洛阳伽蓝记》中找到更多的史料加以研究。再从社会风俗来看,《别史》通过列举《洛阳伽蓝记》中有关法云寺介绍中对于河间王元琛与章武王元融的奢侈、贪婪之风的刻画,高度还原了北魏王公贵族的腐朽糜烂的生活,重在批判;而《史料价值与不足》则通过报德寺中南北两地饮食习惯的差异,对比了当时南北方风俗习惯的不同,又通过列举茶马贸易的历史现象得出“随着民族融合的发展,南北各地的风俗习惯正在互相渗透”([18]: p. 105)的观点,重在探讨社会生活的地区性差异与融合。

从思想文化的层面来看,《别史》中主要通过研究《洛阳伽蓝记》中对已佚失的《惠生行传》与《魏国以西十一国事》二书的记载,详实地描述了宋云、惠生西行求法的过程,为如今研究中印文化交流以及古代西域文化提供了珍贵的资料,从而奠定了相关领域研究的基础;《史料价值与不足》中谈及杨衒之的迷信思想,这一点从《洛阳伽蓝记》中的诸多内容中均可看出,由此,便可以由小及大,发现北魏时期人们思想中浓厚的迷信主义色彩。

比较来看,王柳芳《论〈洛阳伽蓝记〉中的洛阳形象》与白翠琴、李靖莉两篇史料论文均依托原书文本挖掘北魏洛阳城市与社会历史内涵,均从政治、经济、文化多维度展开考证;前者创新建构四元洛阳城市形象体系,兼顾市民视角与中外交流,研究框架立体完整,但侧重城市形象建构,对史料局限缺乏反思;白、李二文专论全书史学思想,二者均聚焦北魏末年乱象,却各有侧重,白翠琴论证详实,以城市规模、贵族奢靡、西行史料实证经济与中外交流,李靖莉多宏观评述,经济部分缺少文本例证,胜在南北风俗融合、时人迷信思想的独特视角。整体而言,城市形象研究重整体阐释,史料辨析的论文长于史实考辨,后续可结合二者思路,融合城市形象分析与史料辩证,兼顾史料优势与文本局限性展开综合研究。

5. 园林美学：佛寺园林与北朝造园思想的文献重构

对书中所记载的寺庙园林的研究,是近年来兴起的《洛阳伽蓝记》的研究热点。关于此方面的研究主要分为两个层面:一是对园林本身的研究,主要论文有薛瑞泽的《读〈洛阳伽蓝记〉论北魏洛阳的寺院园林》[19]、张鹤泉、赵廷旭《北魏洛阳寺院园林营建考——以〈洛阳伽蓝记〉为中心的考察》[20]、《〈洛阳伽蓝记〉中所见北魏宦官与佛教寺院研究》[21]三篇。二是对于其美学史的探索,主要论文有席格的《〈洛阳伽蓝记〉的美学史价值》[22]一文。接下来,笔者将从这两个层面对此方面的研究成果进行简要概述与总结。

在园林本身的研究层面,《读〈洛阳伽蓝记〉论北魏洛阳的寺院园林》一文主要从“寺院园林的植物”、“寺院园林的构成”、“寺院园林的文化特色”三个角度展开。在“寺院园林的植物”中,作者通过详实的文献材料对园林中的植物进行了分类:树木类(桧树、柏树、松树、桤树、椿树、桑树、枳树)、果树、花草(竹子、香草、合欢、鸡头鸭脚之草、兰、菊、萍),分门别类地考察了《洛阳伽蓝记》中所载的各类植物。在“寺院园林的构成”中,作者指出洛阳寺院园林有两种形式,其一是园林与寺庙建筑的融合;其二是舍宅为寺的现象,并从北魏时期崇尚佛学的社会风气对其加以分析。在“寺院园林的文化特色”中,文章通过分析寺院园林豪华的特点,得出北魏时期贵族生活奢靡的结论,并从佛教重视来生的角度分析了北魏时期佛教寺院兴盛的社会心理因素。

《北魏洛阳寺院园林营建考——以〈洛阳伽蓝记〉为中心的考察》一文则从园林营建兴盛原因、类别、景观三个方面进行研究,在分析园林兴盛的原因时,作者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多个角度进行剖析,论证严谨,条理清晰。除此之外,作者根据修建园林的社会群体的不同,将洛阳寺院园林的类别分为“皇帝与后妃所立寺院园林”、“贵族、官僚所立寺院园林”、“平民所立寺院园林”、“西域胡人

所立寺院园林”四种，并对每一种类型加以描述，这有利于我们对北魏洛阳寺院园林的分类研究，使得研究进一步细化。在分析洛阳寺院园林景观的营建时，作者将寺院中的园林分为毗邻寺院单独修建的园林与寺院庭院的绿化与园林化，接着引用大量的史料对寺院中的假山、水池的修建以及植物的栽培进行了陈述说明。最后，作者得出了北魏寺院园林的修建在规模、制作技艺等方面均达到很高水平的结论。并进一步指出北魏寺院及其园林的建设隐含着虚化的外在美。

与前两篇文章不同，《〈洛阳伽蓝记〉中所见北魏宦官与佛教寺院研究》中根据修建群体的不同将寺院分为皇家出资修建寺院与宦官修建寺院，并分析了宦官参与寺院修建的政治、经济、才能以及宗教心理方面的因素，具有新意的是将视角放在宦官这一较为特殊的群体身上对相关问题进行分析，新颖独到。

对于其美学价值的探索，则是研究《洛阳伽蓝记》的一个新角度，目前来看，关于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并不是很多，而且多为跨学科研究，因而难度也比较大。笔者认为《〈洛阳伽蓝记〉的美学史价值》一文可供参考，后继者或可借鉴。在文章初始，作者陈述了《洛阳伽蓝记》的文学审美未受到充分重视的现状，并且分析了原因：对于散文作品缺乏重视；固守汉民族正统观念，对胡族文学成就的轻视；城市文学审美视角的缺漏。并且简要梳理了此领域研究的学术成果，在此基础上，作者从城市美学研究深化、美学学科定位的位移角度分析了近年来此方面研究蓬勃兴起的条件。之后，作者将重点放在了对《洛阳伽蓝记》中的城市、艺术、文化审美上来，在城市审美方面，作者通过引用大量的原著原文资料，指出《洛阳伽蓝记》中体现了复古继承、创新发展的中原都城审美观念与融入都城的佛教、草原审美观念。

在艺术审美观念角度，作者以音乐为例，分析了“多元审美观念在佛教艺术中的融合”([22]: p. 152)。在文化审美方面，作者从民俗、休闲、民间艺术审美三个角度审视《洛阳伽蓝记》中蕴含着的审美观，最后，作者从整体性的角度出发，指出《洛阳伽蓝记》展现了“北魏洛都通过民族与文化大融合所达成的审美融合，也即经由胡汉融合的民族共同体、多元文化融合的文化共同体所达成的审美共同体”([22]: p. 155)。在这里，作者提到民族、文化、审美三个“共同体”，实则是将对艺术审美的研究置于北魏汉化这一大的历史背景之中，从民族交流、融合的角度高屋建瓴的分析艺术审美的特点，这种时空观念值得学习，也颇有借鉴之处。

以上四篇文章均依托《洛阳伽蓝记》考察北魏洛阳寺院与城市审美，以文本史料为核心论据：前三篇聚焦寺院园林，第一篇分植物、空间构成、文化特色三层梳理园林样貌，框架清晰但成因分析维度单薄，第二篇从营建动因、园林分类、景观营造展开，兼顾多维度社会背景与细致类型划分，论证更为系统详实，第三篇单独以宦官群体为切入点划分寺院，视角新颖，却仅围绕修建群体展开，园林景观相关论述不足；第四篇跳出园林实体研究，转向跨学科美学探析，剖析胡汉交融下多层审美共同体，学术视野宏大，弥补现有园林研究美学维度缺失，但同类研究偏少，部分观点缺少同期文献佐证。整体而言，园林类文章侧重实物营建考证，实证性强，美学论文视角前沿宏大，史料支撑尚有拓展空间。

总之，园林美学是近年来《洛阳伽蓝记》研究的一大热点，因其以具体的寺院园林为切入点，因而具有角度小、可操作性强等优点，便于深入具体的研究。目前来看该方面研究成果较少，后继者亦可大有所为。

6. 结论

综上所述，纵观百年研究，《洛阳伽蓝记》传统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文本的校注与梳理、作者与成书背景的考证、洛阳形象与北魏社会风貌、宗教史、史学思想方面；近年来园林美学逐步成为研究热点。笔者认为，后继者今后可以将研究重点放在《洛阳伽蓝记》中的园林美学以及其为其他历史研究提供史料佐证上来。

此外,学界目前关于本书在文献校勘、城市地理、文学叙事、佛教文化等方向的研究已积累深厚,但仍存在结构性薄弱环节:其一,作者与思想研究受史料限制,缺乏整体性传记与思想谱系建构;其二,文本细读与文学研究集中于语言风格,对叙事结构、修辞策略、废墟书写、记忆诗学的探讨不足;其三,专题史研究不均衡,佛教考古、艺术史、物质文化、性别视角、基层社会研究成果稀缺。

《洛阳伽蓝记》以小见大,以一城一寺观照一代一朝,其历史影响远超地理志与佛教史。未来研究应在精校文本的基础上,强化文献考据与理论阐释结合,打通文学、史学、考古学、宗教学与艺术史,以城市记忆、文化认同、政教关系、中外交流为新支点,推动该书研究走向更精细、更整合、更具理论深度的新阶段,为北朝社会与中古文明研究提供新的学术增量。

参考文献

- [1] [北魏]杨衒之. 洛阳伽蓝记[M]. 尚荣,译注. 北京:中华书局,2011.
- [2] 王建国. 《洛阳伽蓝记》的作者及创作年代辨证[J]. 江汉论坛,2009(10): 87-92.
- [3] [唐]释道宣. 广弘明集[M]. 巩本栋,释译. 北京:东方出版社,2018: 136.
- [4] [北齐]魏收. 魏书[M]. 唐长孺,点校. 北京:中华书局,1974: 卷一零六《地形志》.
- [5] [东汉]班固. 汉书[M]. 颜师古,注. 北京:中华书局,1962: 卷二十八《地理志》.
- [6] [南朝]范晔. 后汉书[M]. 北京:中华书局,1965: 卷20《郡国志一》.
- [7] [北魏]杨衒之. 庙记[M]//乐史. 太平寰宇记. 北京:中华书局,2007: 卷30.
- [8] [北魏]杨衒之. 《洛阳伽蓝记》钩沉[M]. 唐晏,订. 新北:广文书局,1981.
- [9] [北魏]杨衒之. 《洛阳伽蓝记》校笺[M]. 杨勇,校笺. 北京:中华书局,2006.
- [10] [北魏]杨衒之. 《洛阳伽蓝记》校释[M]. 周祖谟,校释. 北京:中华书局,2021.
- [11] 王建国. 《洛阳伽蓝记》丛考[J]. 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10(4): 32-36.
- [12] 谭代龙. 《〈洛阳伽蓝记〉校注》标点献疑[J].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2): 107-110.
- [13] [北魏]杨衒之. 《洛阳伽蓝记》校注[M]. 范祥雍,校释.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
- [14] 化振红. 《洛阳伽蓝记校注》疑误商榷[J]. 古汉语研究,2002(3): 94.
- [15] 刘治立. 《洛阳伽蓝记》自注的再认识[J]. 史学史研究,2001(3): 45-52.
- [16] 王柳芳. 论《洛阳伽蓝记》中的洛阳形象[J]. 兰台世界,2013(6): 9-10.
- [17] 白翠琴. 一部拓跋鲜卑的别史——略论《洛阳伽蓝记》史学价值[J]. 民族研究,1999(6): 87-93+110.
- [18] 李靖莉. 《洛阳伽蓝记》的史料价值及不足[J]. 史学月刊,1997(1): 104-105.
- [19] 薛瑞泽. 读《洛阳伽蓝记》论北魏洛阳的寺院园林[J]. 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1(2): 31-36+123.
- [20] 张鹤泉,赵延旭. 北魏洛阳寺院园林营建考——以《洛阳伽蓝记》为中心的考察[J]. 史学集刊,2014(5): 44-52+108.
- [21] 武海龙. 《洛阳伽蓝记》中所见北魏宦官与佛教寺院研究[J]. 殷都学刊,2014,35(2): 36-39.
- [22] 席格. 《洛阳伽蓝记》的美学史价值[J]. 中州学刊,2017(12): 149-155.